

女学热点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

——从性别视角解读《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

·编者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首设“促进性别平等”专节。本文作者提出，白皮书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视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内容，展现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将性别平等置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位置，则进一步凸显中国政府将保障妇女权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的重要主张。白皮书强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任重道远”，为此，需切实提高妇女参与权力与决策的水平，认真倾听妇女声音，真正将性别平等纳入国际发展合作主流。

李英桃 张瀚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顺应时代要求，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呈现新气象、实现新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在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部分，首设“促进性别平等”专节，肯定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妇女事业，为妇女成长创造机会，支持和帮助妇女享有出彩的机会，并从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和支持妇女能力建设两方面介绍了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中促进性别平等的理念与举措。

第一，南南合作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对外援助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内容，发展中国家妇女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受益者。

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为促进妇女参与与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在南南合作中注重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技术培训和物资援助。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国共向50个国家的妇女儿童组织提供了101批实物援助。根据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中国分别派遣草蓼编、玉米皮编和刺绣技术小组赴莫桑比克、墨西哥等国传授技术，帮助培训当地妇女。2014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提到，“卢旺达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开展菌草、稻谷等种类的适应性研究、试验和示范工作，注意结合当地传统农业，并将技术培训推广至卢旺达妇女协会、稻谷种植协会等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开展妇女发展援助项目，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妇女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为落实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承诺，2015—2020年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100个“快乐校园工程”和100个“妇幼健康工程”，邀请3万名妇女来华培训，在当地培训10万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在13个国家建立中外妇女培训（交流）中心。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14个国际组织，通过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实施82个项目，其中妇幼健康领域所使用基金占6.82%。

第二，与国际组织合作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形式，妇联等组织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积极推动者，中国妇女既是国际发展合作的受益者又是贡献者。

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妇联连续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等官方和民间援助机构合作，开展合作项目700余个，培训30多万人，执行合作项目范围遍及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妇联等组织还多方争取国际资金及物资援助，积极实施扶贫项目，帮助贫困地区妇女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消除贫困、促进妇女发展方面取得瞩目成就。在接受外来援助减少的同时，中国逐步扩大了对外援助规模。中国一直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积极与有关各方探讨开展三方合作，丰富国际发展合作的方式和途径，提升国际发展合作的水平和能力。在2015年召开的全球妇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向妇女事业捐款1000万美元。

2020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表示中国将继续加大对全球妇女事业的支持力度，中国将

在未来5年内再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1000万美元捐款，继续设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支持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倡议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第三，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内容，将保障妇女权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是中国政府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主张。

中国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未提及妇女与性别议题，2014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略有提及，而《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在第四章“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专门设有“促进性别平等”内容。

性别平等不仅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五个目标，而且贯穿在其他16个目标中。白皮书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视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主要内容，展现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将性别平等置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位置，进一步凸显中国政府将保障妇女权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的重要主张。

第四，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将性别平等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关重要。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崇高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走向“共同繁荣”的伟大事业，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掉队。性别平等则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原则。构建性别平等的命运共同体，就

要确保妇女既成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平等参与者和贡献者，又成为与男子同等的受益者，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根据有关国家发展需要，中国积极开展发展合作，在深化政策沟通、加快设施联通、推动贸易畅通、促进资金融通、增进民心相通上发挥作用，为各国发展培育空间、创造机遇，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小额物资援助，帮助当地妇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加强能力建设。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是中国所秉持的促进本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初心，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的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必须认识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仍没有消除发展过程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状况，针对妇女的歧视仍然可见；在中国国内的案例中亦可可见到。《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强调，“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任重道远。”为早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掉队，尤其需要切实提高妇女参与、特别是参与权力与决策的水平，认真倾听妇女的声音，充分发挥妇女和妇女组织的主体作用，真正将性别平等纳入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流，“让发展之花在世界更多地方盛开，让发展果实惠福更多国家和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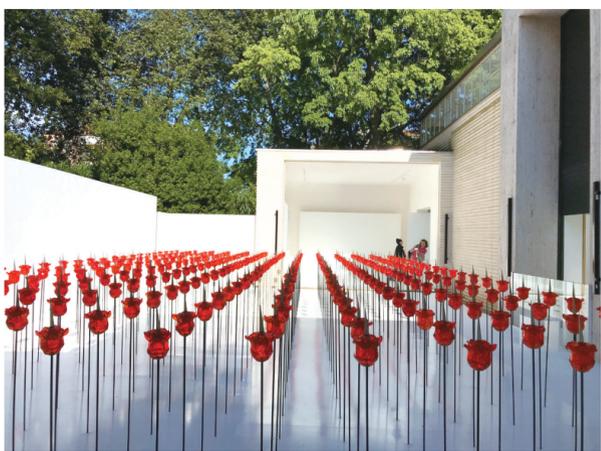
（李英桃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瀚之为该院硕士生）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艺术映像

雷纳特·贝特尔曼

『我爱故我在』



在第八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玫瑰』。

艺术史每天都在被改写。这种“改写”有时是隐形的，因为尽管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艺术，但有些艺术在其问世之初却并不一定为同时代的人所重视和接受，随着时间的“距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曾被忽视或低估的作品方显现出其越来越重

要的价值。奥地利视觉艺术家雷纳特·贝特尔曼(Renate Bertlmann,生于1943年)的艺术便属于这一类。

贝特尔曼通常被视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艺术家，但她的前卫艺术创作却是在学院里孕育的。她1964年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

绘画与传统手工艺，在校期间接触到维也纳行动主义、激浪派艺术以及伍尔夫和波伏娃等人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毕业后留校任职12年(1970—1982)，负责教授构图和各种绘画技巧。与此同时，她还为《独立妇女行动》杂志提供文字和图像。1969年，她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自拍，创作出《变身》系列，通过对性别与社会性别、身份与社会身份进行分析，探索个人和集体记忆的空间，向女性身份的传统界定提出质疑。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在1980年代却凭借几乎相同的自拍摄影而享誉全球。

自1970年代初以来，贝特尔曼就始终围绕性、爱、性别主义、非勒斯中心主义等主题进行创作，她利用智慧和黑色幽默，通过绘画、雕塑、素描、拼贴画、文字、摄影、电影、装置、表演和其他方式探讨这些问题，并不断进行非艺术性媒介和材料的多元化实验，以扩展艺术的外延与内涵。1973年，贝特尔曼在维也纳艺术家之家举办了首个个展，她通过在展览之际写下的文字“为什么不画花？”，呼吁女性艺术家将女性味带入艺术世界。这也表明了与1970年代其他女性主义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她从一开始就不刻意回避温柔的女性特质，并常以与众不

同的幽默感描述女性的欲望；她也不局限于对特定的女性美学的追求，甚至有时会滑入男性角色，经常用带来感官享受的物品，例如避孕套和安抚奶嘴等将性与童趣相联系的现成品来模糊性的界限。她从不忌讳禁忌与尴尬，也不惧怕媚俗，她几乎是以一种愉悦的姿态拆除父权制社会男性力量和权威的烙印。当时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呼吁专注于纯女性主义，因而对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多有批评，但如今，女性艺术家却有意识地拒绝强调其性别身份，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平等观念的带有讽刺性的浪漫主义女性主义艺术已彰显出特殊的价值。

1976年，贝特尔曼与琳达·克里斯塔内尔共同创立了“BC-共同体”，尝试利用超8摄像机相互拍摄。1978年，她开始将“我爱故我在”作为其艺术创作的座右铭，她从女性的明确角度出发，以“爱”替代“普遍怀疑”，不仅挑战了仅基于逻辑的哲学，也挑战了试图通过道德规范将灵魂与肉体分离的神学，以及重视力比多而排斥精神的心理学理论。此外，她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分为“色情”“反讽”和“乌托邦”三个主题，它们相互渗透且相互依存，意味着灵与肉在不可分割的个体中的等同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贝特尔曼的

作品变得更加直接，更具讽刺意味和侵略性，例如在1982年创作的摄影作品《奶嘴刀》中，艺术家双手的十个指尖套上了奶嘴，手术刀由内向外从奶嘴上刺出，艺术家利用这种安抚与威胁并存的矛盾强化了作品的视觉魅力；再如作于1985年的《奉献物》，尖锐的刀从心形躯干上的两个乳房之一中刺出，意想不到的伤害成为针对男性淫荡目光的脆弱威胁。贝特尔曼本人在描述自己的作品时经常使用“风险美学”一词，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审美与观念在刀尖上的融合。

2019年，贝特尔曼代表奥地利参加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以“我持异议故我在”命名的国家馆展览由三个部分组成：位于展馆正面几乎与展馆外墙等宽的雕塑“我爱故我在”、展馆内贝特尔曼几十年来进行艺术实践的图像陈列以及后院用312支被尖刀刺穿的玫瑰构成的装置（红色玫瑰花均以威尼斯穆拉诺岛特有的手工玻璃工艺制成）。艺术家试图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重复修改，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讲述自己与世界之间相互尊重和温柔以待的关系。

爱是贝特尔曼反叛的诗性观中最内在、最温暖、最坚韧和最富有诗意的领域，通过它，人类的荒谬和矛盾得以最深刻的揭示。

专家视点

积极构建“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的生育支持制度

·阅读提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的思路。本文作者提出，为构建有利于降低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的生育支持制度应重视生育保险政策的基础地位；警惕单位负责制的苗头，推进社会统筹彻底化；实行“企业+个人+政府”三方共担生育保险费用的分担机制；对生育保险政策进行系统性评估，从传统方案型评估向目标型评估迈进。

庄渝霞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并存是当今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两大挑战，如何提高生育率，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环节。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的思路。因此，如何构建有利于降低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的生育支持制度显得非常迫切。

生育保险政策是我国生育支持制度中最基础、最长久和较完善的制度安排，是构建生育支持制度的重要平台和根基所在，其他支持生育的制度安排是围绕生育保险政策的扩展和延伸。此外，生育保险政策出台的宗旨和目标之一在于平衡企业用工成本，推进在就业领域内的性别平等。针对“各企业只对本企业职工生育负责”这一做法所带来的不公平性及社会化程度不够的不足，我国于1988—1994年进行生育保险改革试点，最终于1994年出台《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确定采取社会统筹的方式来替代单位负责制的做法，以平衡企业用工成本，消除企业招工对女性的歧视。

完善政策衔接，推进社会统筹的全面化

在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各地相继修订地方计生条例，对产假和父亲护理假进行了调整，大部分省份的产假为最长的180天到最短的128天不等，西藏甚至长达1年；护理假为7—30天，15天最为常见，而且，产假和父亲护理假期间工资

照发。由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之间没有做好相应政策衔接，导致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出台新的生育保险待遇时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生育保险待遇分为两部分和两种方式领取：一部分是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要求，98天产假由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这一做法是采取社会统筹方式支付；另一部分是按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增加的产假和护理假视为出勤，工资由用人单位支付，这是延续单位负责制的做法。单位负责制的做法是1994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实施社会统筹管理方式至今的一次倒退，它将再次把女性生育成本推给用人单位负担，毋庸置疑会加重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对女性就业的歧视。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有效做法是进行政策衔接，将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做法彻底化，建议增加的产假工资待遇仍然由生育保险基金名下支出。

生育和养育成本的分化最为关键

改革生育和养育成本由企业单独承担的固有作法，实行“企业+个人+政府”三方共担生育保险费用的分担机制，是生育保险能否真正服务于“推进就业领域内性别平等”这一目标的关键处。生育成本并不仅仅指产假和生育保险等显性成本，还包括实施劳动保护、招聘临时替工带来的不便及额外支出，以及因养育需要带来的女性劳动率降低的影响。社会保障是实现权责统一的制度安排，养老和医疗保险享受的前提是个人必须缴纳费用，生育保险也脱离不了这一性质，建议对个人缴纳生育保险

费用展开研究。此外，应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第3号公约、1952年第83号公约、2020年第183号公约《生育保护公约》的要求，政府承担着生育保险的主要财政责任。不少专家呼吁，除了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生育保险之外，还应在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金额用于支持生育保险，并起兜底作用。

生育保险政策评估是政策改革的前提

由于生育保险政策不同于养老和医疗保险等政策，它还有平衡企业用工成本和推进就业领域内性别平等的社会目标。因此，需要对生育保险政策进行系统性评估，从传统方案型评估向目标型评估迈进。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生育保险政策内容评估。按照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男性缴纳生育保险费用，也有权利享受生育保险基金，护理假应该纳入生育保险待遇范畴。同样，二险合并后统筹层次虽然提高到省级层面，但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以及未婚生育等特殊人群如何纳入享受，仍需要进行政策设计，确实拓展覆盖面。二是基金可持续性评估。应按照国家费率、生育人次、津贴期限、津贴水平等因素，对生育保险基金进行科学测算预算。三是对生育效应、母婴健康和女性就业的保障效用进行评估。政策有正效用，也有负效用。对产假时长和生育保险的设计都应进行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

生育支持制度建构可以分“四步走”同时推进

在生育保险基础上构建生育支持制度，可以分四步走：第一步，做好生育保险政策内容扩展，

在产假和生育津贴基础上，加入哺乳假、父产假、父育津贴、父母假、父母津贴等。为了消除生育和养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出台父亲假和父母假，让男性参与养育。从这个意义上讲，生育保险是很关键的政策选择，产假和生育津贴只是生育保险政策的基础内容，父亲假（护理假）和父亲假（育儿假）可以在此基础不断纳入。第二步，加强生育保险体系建设，除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外，还应加强生育福利和生育救助建设。生育福利是指向不被生育保险所覆盖的城乡未就业女性提供生育补助，生育救助是生育保险安全网的最后一道底线，是保障生育保险和生育福利无法惠及的人群。第三步，建立生育保护体系，做好生育保障、健康（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与非歧视之间的政策连接。第四步，构建生育支持制度，它是包括生育保护、0—3岁幼托服务、灵活工作时间的安排的一揽子政策。

构建以生育保险政策为基础的生育支持制度，重视生育保险政策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破解生育率持续低下的关键一步。家庭主义的兴起，建立伴侣信任关系、推行性别平等方案，出台妇女友好的家庭政策；提倡社会公正和重视个人价值，都将有助于鼓励女性从想到到敢生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202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险合并后生育保险政策内容扩展和基金可持续性研究”（20BSH051）阶段性成果。